

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

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

藍 適 齊^{*}

摘 要

作為對臺灣近現代歷史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韓戰在近年來卻成爲了一個被忽略的歷史課題。本文結合史料與「歷史記憶」研究方法，從歷史脈絡中來分析韓戰記憶在臺灣的變化。以中華民國官方所發行的《中央日報》以及當時所舉辦的各種慶祝紀念活動爲焦點，本文首先分析1950年代臺灣的官方論述如何把「反共義士」建立成韓戰集體記憶中的核心，進而塑造韓戰爲國民政府反共勝利和中（華民國）韓兩國情誼堅固的象徵。本文更進一步指出，臺灣的韓戰歷史記憶在1960年代之後出現了顯著的改變。隨著官方反共論述的「世界化」與「抽象化」以及臺灣國際局勢的轉變，韓戰的「反共義士」不再被賦予如過去的重要意義，而形塑「韓戰」作爲集體記憶的活動與報導更是迅速地消退。而時至1990年代，由於臺灣身分認同的改變，以及臺韓關係與臺灣對韓國態度的改變等因素，韓戰相關的紀念活動多被忽視甚至全面停止消失，韓戰也就在具有「協調性的遺忘」之下快速地從大眾的記憶中退場。戰後這六十年來韓戰記憶在臺灣的

^{*} 作者現任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興衰變化，正反映了歷史記憶隨著身分認同改變的現象，更清楚顯現了歷史記憶作為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而本文對「韓戰」歷史記憶在臺灣的建構與變化所作的分析，同時也說明了歷史記憶與政治觀念之間相互的影響。

關鍵詞：韓戰、歷史記憶、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義士」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Korean War in Taiwan

Lan Shi-chi

Abstract

In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the Korean War is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events. However, it has rarely been discussed in present-day Taiwa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such a significant event was remembered and then forgotten in collective memory over the past sixty years in Taiwan.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Korean War became known and commemorated in Taiwan in the 1950s. It finds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Korean War was widely represented through state media and mass mobilization as a symbol of Republic of China (ROC)—(South) Korea solidarity and ROC/Taiwan’s own victory over communism. At the height of ROC’s fight against communism, memory of the Korean War—centered on the arrival of more than 14,000 Chinese prisoners of war or later known as the “anti-communist righteous heroes” in 1954—became the base on which the ROC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its ruling legitimacy in Taiwan. This paper then examines the remembrance of the Korean War between the 1960s and the 1980s. It finds that following the diplomatic setback and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the ROC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e (memory of the) Korean War lost its significance into the official “anti-communism” discourse and became marginalized in collective memory in Taiwan. Furthermore,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Taiwan-based political identity and deterioration of ROC-Korea relationship, very limited narratives or activities continue to commemorate the Korean War. Under what is known as “concerted forgetting”, the Korean War became the “forgotten war” in Taiwan. The changing memory of the Korean War in Taiwan 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historical memory has been shaped by present-day political concerns; at the same tim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as have been shaped by historical memory.

Keywords: the Korean War, historical memory, Republic of China (ROC) government, “anti-communist righteous heroes”

從「我們的」戰爭到「被遺忘的」戰爭：

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

藍 適 齊

一、前言

在韓戰爆發滿六十周年的2010年，臺灣的一份報紙是這麼評論韓戰對臺灣的影響的：

其實，臺灣應該感謝韓國，六十年前韓戰爆發，使美國放棄坐視不管的政策，派出第七艦隊協防臺灣，使得臺灣未落入中共魔掌。臺灣人民固然討厭蔣介石政權，但兩害相權取其輕，若是當時臺灣被中共佔領，臺灣人民的命運一定會比在兩蔣統治下更悲慘。更重要的是，臺灣縱然被兩蔣這個外來政權佔領，但國民黨實際上已無法回去中國，因此歷經政治改革與經濟發

* 本文部分內容曾經宣讀於「冷戰亞洲的誕生：新中國與韓國戰爭」國際研究會（首爾：聖公會大學主辦，2013年3月8-9日）；筆者要感謝在會上惠賜意見的多位學者，特別是促成此項研究的任佑卿教授。另外，筆者要感謝《東亞觀念史集刊》的多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建議，以及政治大學楊文喬和藍萱所提供的協助。本文為科技部一般型研究計畫「『臺籍戰犯』、帝國崩解、與戰後國際秩序的重構：臺灣二戰史與『殖民戰爭責任』的新思考，以及一併進行的建立『臺籍戰犯』資料庫」（計畫編號：NSC103-2410-H-004-210-）之部分研究成果。

展後，更加確立臺灣主權獨立的地位。若是美國袖手旁觀，等待塵埃落定，臺灣恐怕會慘遭中共蹂躪，淪為中國的一部分，無法翻身。因此，戰爭行為固然不值得鼓掌，但韓戰的發生確實救了臺灣。¹

的確，韓戰可以說是近代影響臺灣發展最重要的戰爭，特別是對兩岸關係方面。即使比較具有反思的臺灣學者也不否認，韓戰扭轉了1950年迄今的兩岸關係。例如歷史學者張淑雅，在其2011年出版的《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一書中，就對此論點提出了更為深入的反思。她認為「美國並未因為韓戰爆發或中共介入，就決定要拯救國府」。但是，在書末她也表明「無意完全否定『韓戰救臺灣』的論斷」，而提出「比較貼近事實的說法是，韓戰給了國府一個拯救自己的機會……因此也給了臺灣一個不被中共接管的機會」。²如同上述所論，韓戰使得中華民國政府得以在臺灣維繫它的政權，也形塑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臺灣海峽兩岸分治（也對峙）狀態。因此，雖然臺灣並未直接參與韓戰，³但是從國際政治／兩岸關係發展的角度來看，韓戰都應該被視為對臺灣近現代發展最重要的戰爭之一，也是在（二）戰（以）後對臺灣影響最大的歷史事件之一。

¹ 〈自由評論：韓戰救了臺灣〉，《自由時報》，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may/27/today-f1.htm>，檢索日期：2012年12月10日。需要指出的是，在臺灣的主要報紙當中，《自由時報》被認為在意識形態上是比較傾向「綠」的。見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臺灣報業〉，《新聞學研究》第95期（2008年1月），頁183-212。在該報的版頭也特別以「臺灣優先，自由第一」等文字，標明主張「臺灣本土意識」的立場。

²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社，2011年），頁252-254。「國府」一詞現在多用「中華民國政府」代替，但是本文中引用原文時仍保持「國府」一詞。

³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確實曾經透過非官方的方式，與美國合作參與了後勤與情報等工作。請參見幾位當事人的回憶錄：黃天才：《我在38度線的回憶》（臺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10年）；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韓戰的停戰協議在2013年屆滿六十年。此時正是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時刻，來重新檢視韓戰在臺灣歷史上的意義。但是當我開始蒐集相關資料的時候卻發現，雖然國際學界對韓戰的研究仍然非常熱烈，⁴臺灣對韓戰的研究或討論卻非常有限。除了上述的評論與著作之外，臺灣對韓戰的研究大多是有關戰略安全的議題，⁵或是回憶錄性質的著作，⁶少有論及韓戰對臺灣的影響與其歷史意義。⁷而在大眾媒體中，對韓戰的討論或公開的紀念更是罕見。可以說近年來在臺灣，韓戰似乎已經成爲一個被忽略的歷史課題。對今天在臺灣的大眾來說，有許許多多更爲熟悉的戰爭，諸如在中小學課本裡面一定會不斷強調的「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或稱庚子拳亂）、「甲午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1937-1945）等等，或是因電影《賽德克巴萊》在2011-2012年上映後而引起更多興趣的「霧社事件」（1930）。相比較之下，距離今天比較近的韓戰反而似乎在認識上是一段比較遙遠的歷史。

爲了更廣泛地了解當代臺灣社會對韓戰的認識，我在2013年曾經在自己的課上設計進行了一個小小的「實驗」，調查大學生對韓戰的歷史認識，特別是韓戰的「歷史重要性」以及「對臺灣的歷史意義」。⁸對象是在「臺灣史」（歷史學系的必修課）課上的學生，其中

⁴ 參見張淑雅：〈近二十年來的韓戰研究概況〉，《近代中國》第137期（2000年6月），頁105-116。

⁵ 參照董致麟：《韓戰爆發前後蘇中（共）美互動之研究（1945-1951）：認知理論的觀點分析》（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輔仁歷史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頁253-282。

⁶ 例如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邵與王曾先後擔任中華民國駐韓國大使。另外，參見本身爲反共戰俘的高文俊所著：《韓戰憶往：浴血餘生話人權》（臺北：生智文化公司，2000年）。

⁷ 少數討論韓戰紀念的學術文章，請見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收於國史館編：《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643-677。

⁸ 詳細的內容，請參見本文最後的「附錄：學生調查」。在此，作者要特別

大多數都是歷史學系大學部的學生。「實驗結果」顯示，在未經提示的情況之下，回答韓戰是「歷史上重要的戰爭」的比例低於10%。經過表列提示十個與臺灣有關的戰爭後，認為在其中韓戰對臺灣歷史影響的重要性排名前三的比例，升高到40%左右。最後，學生回答帶有最直接明顯提示的問題：「如果1代表在臺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戰爭，10代表重要性最低的戰爭，你會給韓戰排第幾？」結果，認為韓戰的重要性排名前三的比例更升高到60%。

學生回答的結果顯示，在被要求直覺反應的時候會想到回答「韓戰」的比例，與經過提示或思考之後會想到回答「韓戰」的比例有非常巨大的落差。後面兩個部分的作答結果顯示，在經過提示或思考之後，其實大多數的學生都認為韓戰是對臺灣歷史影響比較重要的戰爭。那麼，為什麼在一開始的回答中韓戰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很明顯的，雖然學生在知識面上都知道韓戰對臺灣歷史的重要影響，但是韓戰並不是一個常常會被提到或討論或得到紀念的戰爭，以至於在最直覺反應的時候，韓戰這麼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會被嚴重的忽略。

那麼，臺灣的學校課本又是如何討論韓戰？在目前臺灣所採用的學校課本中，韓戰當然是在近現代歷史當中會被提及的一項歷史事件。但是仔細閱讀後就會發現，多數課本對韓戰的描述都相當簡短，而關於韓戰的歷史意義，更少有與臺灣相關的闡釋。以國中的課程為例，在此階段並沒有獨立的「歷史」科目，與歷史相關的內容多在「社會」此科目當中。分析社會課本的內容，幾個比較廣為採用的版本在第1冊、第4冊、以及第6冊中都會提到韓戰。第2冊是在「戰後臺灣的外交與兩岸關係」的主題（也是歷史脈絡）下介紹韓戰，主要的內容多是「韓戰爆發，美國為防止共產勢力擴張，派遣第七艦隊協防臺灣海峽」；爾後，在1954年「美國和我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正式「將臺灣納入東亞反共防衛體系內」。⁹這樣的描述確實向

感謝當時就讀於中正大學並參與此項調查的學生們。

⁹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王良卿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二

讀者介紹了韓戰此一事件，但是論述的主體為美國，而並非以臺灣為出發點；內容並未明確指出韓戰或美國介入對臺灣具體的影響，也未討論臺灣（官方或民間）對韓戰的反應。在第4冊中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這個主題之下，提到韓戰爆發之後中共在「抗美援朝」的號召之下派出志願軍參戰。¹⁰ 雖然再一次的介紹韓戰，但是論述的主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闡述臺灣的回應或是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而在第6冊中又再一次的討論韓戰，主題和歷史脈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情勢。其中論述的重點為二戰後分裂的朝鮮半島、蘇聯的角色、美國與聯合國的介入，以及1953年以北緯38度線為界的停戰協定等等。¹¹

以上的分析顯示，雖然國中課本再三地討論韓戰，但是綜觀其中的論述，卻都並非從臺灣的角度出發。雖然這些課本的內容都確立韓戰作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也表明韓戰對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東亞國際關係都有其重要性；但是，相關的論述卻並未建立韓戰與臺灣的關聯性，更未探討韓戰對臺灣的歷史意義。

臺灣在高中課程中則有獨立的「歷史」科目。歷史課本也必然會

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1年），頁101；江筱婷、李佩鋕、洪立建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二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2年），頁108；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二冊）》（臺南：南一書局，2012年），頁109；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二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年），頁111。

¹⁰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王良卿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四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2年），頁126；江筱婷、李佩鋕、汪盟烽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四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3年），頁134；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四冊）》（臺南：南一書局，2013年），頁120。

¹¹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宋幸蕙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六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3年），頁94；江筱婷、洪立建、徐靜欣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六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4年），頁84；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芃、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六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年），頁86。

討論韓戰。但是，許多高中歷史課本對韓戰的描述——無論是討論的脈絡、內容，或是論述的角度，與以上所分析的國中課本都大同小異。¹² 這樣的高中課本雖然提供了比較多的歷史資訊，但是在建立對韓戰的歷史認識的「框架」這方面，¹³ 可以說只是延續國中課本。以上的分析顯示，臺灣的課本確實傳達了某種對韓戰的認識，但是在這樣對韓戰的歷史認識當中卻看不到多少與臺灣的關係。換句話說，在學校課本中，韓戰似乎並不被作為臺灣自己重要的歷史記憶。¹⁴

上述對學生的「實驗結果」當然是一個非常初步的觀察，班上非常有限的學生人數也不具任何抽樣的統計效力；學校的課本也僅是建立歷史認識的諸多媒介之一，不足以代表臺灣社會的（主流）想法。

¹² 例如賴澤涵主編，蔡怡邦、王宇等編撰：《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一冊）》（臺北：全華圖書公司，2012年），頁178；林能士主編，施志汶、張素玢等編撰：《高中歷史（第一冊）》（臺南：南一書局，2012年），頁170-171、174；林能士主編，楊維真、王良卿等編撰：《高中歷史（第三冊）》（臺南：南一書局，2013年），頁98；林能士主編，陳秀芳、吳翎君等編撰：《高中歷史（第四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年），頁164。

¹³ 此處我參照了最近學者們對臺灣／東亞的歷史認識與「戰爭之框」的討論，參見汪宏倫：〈導論 把戰爭帶回來！——重省戰爭、政治與現代社會的關聯〉，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頁1-34、〈東亞的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157-225；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臺籍戰犯〉，收於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393-433。

¹⁴ 只有少數的高中課本在關於韓戰的討論中，加上了比較多以臺灣為出發點的分析。例如，在臺灣二次大戰後的政治發展此脈絡下，強調在被納入美國的防禦體系之後，臺灣得以「暫時減輕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的武力威脅壓力」；透過史料來帶領學生思考，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外交政策的轉變，「對臺灣的影響為何？」以及在「臺海兩岸關係變遷」的脈絡下，指出因為韓戰的爆發與美國的介入，中共「忙於抗美援朝，暫時無暇於臺海生事」等等。參見薛化元主編，李明仁、李福鐘等編輯：《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一冊）》（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頁174-175；李福鐘、古偉瀛、王世宗等編著：《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頁106。但是，由於這些分析的篇幅非常有限、又分散於不同章節，難以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來認識或探討韓戰對臺灣的歷史意義。

但是，從歷史記憶研究的角度來看，透過對學生的「實驗」以及對學校課本內容的分析，我們確實能夠觀察到臺灣（至少部分）的社會大眾對韓戰的歷史認識。更重要的是，學生的反應與課本中所描述傳遞的歷史認識有相當的一致性。本文並無意作過度簡單的推論，認定是學校課本造成學生的歷史認識；學者的研究早已指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形成牽涉甚廣，絕非單一因素所致。¹⁵ 但是這樣的結果足以顯示，臺灣對韓戰的「忽略」並非個別的現象，而是有其結構性的脈絡。由此衍生的問題是：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是什麼？韓戰這樣一個對臺灣近現代發展影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究竟在臺灣是如何被認識的？尤其是在戰後（嚴格來說是1953年停火之後），韓戰在臺灣被賦予了甚麼樣的歷史意義？初步的歷史考證發現，其實在1950年韓戰爆發以後，曾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韓戰可以說是在臺灣最受到關注與紀念的戰爭。但是韓戰在臺灣社會的集體記憶當中的地位，卻在過去的六十多年間歷經了相當劇烈的變化，從「無所不在」變為幾乎「無處可尋」。這當中的變化原因又是什麼？究竟韓戰是在何時，又是為什麼會受到臺灣社會的忽略和遺忘？本文將嘗試著從歷史脈絡的變化，結合近年來在歷史研究中備受關注的「歷史記憶」研究方法，來回答以上的這幾個問題。

¹⁵ Wur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 (2002 May): 179-197.

二、1950年代臺灣的韓戰集體記憶

本文將以中華民國官方所發行的《中央日報》的報導為代表，¹⁶來分析臺灣社會對韓戰的認識跟記憶是如何的被建構出來的。雖然臺灣在過去的六十年間有許多的報紙與其他媒體，但是對本文所分析的1950至1980年代，在威權戒嚴的統治體制之下，作為官方媒體的《中央日報》對形塑集體記憶的影響力與重要性都遠高過其他的報紙或媒體。因此本文將分析的焦點放在《中央日報》。

事實上在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以前，剛撤守到臺灣不久的中華民國政府是處於一個非常不穩定的國際地位。美國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防禦，以及北京政府積極備戰即將要進行的解放臺灣的戰爭，都保持著消極不參與的態度。對此，中華民國政府也非常了解。1950年6月22日，距離韓戰爆發只有3天，《中央日報》在有關美國亞洲政策的報導當中就以頭版標題寫著：「若麥帥堅決主張加強臺灣防務可能促使政府改變態度」。這一連串的假設語氣，充分顯露了中華民國政府對自己未來的國際地位，以及臺灣（對抗中國共產勢力）的防守毫無把握。¹⁷

1950年6月25日以前，臺灣正值風雨飄搖之際。韓戰的爆發，立刻被中華民國政府當作鼓舞臺灣軍民士氣的大好機會。在韓戰爆

¹⁶ 《中央日報》原為中國國民黨機關報，於1928年在上海創立，1949年隨國民黨遷至臺北，2006年暫停印刷。以下的這段介紹，更能突顯該報對中華民國政府以及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後的臺灣有著多麼大的影響力：「中國國民黨係肇建中華民國的政黨，中央日報則是國民黨創辦的報紙，民國十七年二月一日在上海創刊後，計發行兩萬八千三百五十六號。正由於這一層特殊的關係，使得中央日報不同於一般的傳播媒體，而是一份與國家發展、民族命運共起伏的新聞刊物。蔣經國先生就曾說過：『中央日報具有光榮的傳統，國家的前途與中央日報的前途完全一致；所以，這份報紙具有特別重大的責任』」。參見《中央日報》網路報，網址：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368&docid=100182607，檢索日期：2013年2月2日。

¹⁷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2日。

發以後，《中央日報》的報導很快地就表現出了政府非常積極而正面的態度。首先是有關對韓國的關係：1950年6月27日的《中央日報》就密集地以醒目的新聞標題強調：「中韓邦交固密」、「我國在安理會中 決支持韓國政府」、「李承晚昨與臺北深夜通重要電話」；另外，更刊載了一篇題目為「中韓攜手奮鬥到底」的專論，再次闡述韓戰與中（華民國）韓（國）關係的緊密連結。隔日，又繼續對讀者強調，「我決以最友誼態度 盡力支援韓國」。¹⁸ 很明顯的，中華民國政府很快的就將韓戰視為自己的戰爭。

而更重要的，當然是美國對韓戰的態度與政策，攸關臺灣未來的國際地位。《中央日報》在6月27日就指出：「韓國戰事將促美當局迅速改變遠東政策」。¹⁹ 6月28日的《中央日報》則以放大數倍的字體頭條報導：「美總統昨下令第七艦隊遏止攻臺企圖」。²⁰ 但事實上，《中央日報》對美國政策的報導只說了一半；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Truman，1884-1972）在美國時間6月27日的聲明確實表明「我已下令第七艦隊，防止任何對臺灣的攻擊」，但是同時也主張：

為配合此行動，我要求臺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的海空行動。第七艦隊將確定此令的執行。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安全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聯合國的考量。²¹

張淑雅就指出，美方「中立臺海」原來只是「因應危機所採取的暫時性措施」，並不代表其對國民政府的政策由韓戰爆發之前的「袖手旁觀」立刻轉為支持；美國不但對臺灣的軍事援助「姍姍來遲」，對防衛臺灣的承諾更是要到了1952年春天開始將臺灣視作為「政治資

¹⁸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8日。

¹⁹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7日。

²⁰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8日。

²¹ 轉引自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84-85。

產」以後才較為明確。²² 但是，韓戰的爆發給了中華民國政府在鞏固政權和自我國際地位方面一個全新的希望，對美國的態度也由前述的充滿假設口氣與不確定性轉而成爲自信堅定。外交部長葉公超（1904-1981）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6月28日發表聲明，當中就主張美國已經與中華民國站在同一方，稱「對美防衛臺灣提議 我原則上接受 已令海空軍暫時停止攻擊行動 臺灣地位主權不受影響」，²³ 並充滿自信地強調「美國之建議不影響中國（中華民國）政府對臺灣之主權，或開羅會議關於臺灣地位之決定；並不影響中國（中華民國）反抗國際共產主義及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之立場」。²⁴

這就誠如張淑雅所言，中華民國政府在韓戰爆發之後將美國的介入立刻「加以擴大（甚至略微扭曲）宣傳」，其作用在於「安定人心、提高士氣與穩定臺灣內部情勢」。²⁵ 而本文更進一步的指出，《中央日報》等官方媒體對臺灣社會所傳遞關於韓戰的認識與理解，也就是在這樣「對內精神喊話」的脈絡之下「加以擴大（甚至略微扭曲）宣傳」而展開。例如，在6月29日《中央日報》就進一步的主張韓戰與中華民國政府追求反共目標的關連性。其中一篇報導的標題就指出：「陳院長昭告國人 爲貫徹反共抗俄國策 繼續堅強奮鬥 必須提高警覺 勿存苟安心理」。²⁶ 而幾天後的社論在討論韓戰的意義時，又再次以文章的題目來強調，「勿存苟安心理 繼續堅強奮鬥」。²⁷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方面也同樣的透過《中央日報》，參與建構了韓戰作爲中韓兄弟情誼以及反共志業的象徵。6月29日刊載了一

²² 轉引自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84-85。

²³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9日。

²⁴ 馬全忠：《中華民國百年紀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頁228。

²⁵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53-254。

²⁶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9日。

²⁷ 《中央日報》，1950年7月3日。

篇，由當時韓國派駐中華民國的領事閔石麟（1898-1963）所署名的啟事，內容如下：

此次北韓共軍在蘇聯導演之下，突然全面進攻南韓，消息遙傳，舉世震撼。中韓唇齒相依、憂戚與共。辱承 貴國朝野暨各界人士，或親臨致慰，或函電遙頌，厚意殷拳，無任感激。深信正義必永存，集權終湮滅。²⁸

之後《中央日報》的許多報導，更是繼續對讀者強調韓戰的意義在於中（華民國）韓（國）雙方「唇齒相依憂戚與共」，而且不斷持續密集地報導中華民國政府和民間也都紛紛響應支持韓國抵禦北韓共產勢力的進犯。例如，有關「中國（指中華民國）勞工願援韓國」、「韓僑義勇隊」，以及「反共抗俄後援會」成立及遊行；²⁹ 我國政府現正採取措施援助韓國；³⁰ 我國將派精銳軍隊援助韓國抵抗侵略；³¹ 以及我國正在等待「遣軍赴韓作戰」之最後決定等等的報導。³² 甚至有一篇專欄文章，報導一群不久之前才經歷過中華民國國軍與共軍在舟山群島的爭奪戰，而後撤退到臺灣來的軍民，以「舟山群島戰友」為名，主動提出「志在剿滅匪共 願赴韓國作戰」。³³ 這些報導所強調的都是，以反共為共同目標的中韓兄弟情誼堅固不變。

很明顯的，這些報導所建構出來的韓戰，不但是一場關乎韓國（南韓／大韓民國）生存的戰爭，似乎也是中華民國我們自己的反共存亡戰爭。《中央日報》在1950年7月8日全版刊載的「地圖周（週）刊」報導最具代表性。報導的標題首先強調堅定的反共立場，主張戰勝共產勢力的必然性：「徹底解決問題必須登陸北韓 侵略者

²⁸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9日。

²⁹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9日。

³⁰ 《中央日報》，1950年7月1日。

³¹ 《中央日報》，1950年7月2日。

³² 《中央日報》，1950年7月3日。

³³ 《中央日報》，1950年7月3日。

雖倖獲初步勝利，終將為民主國家所擊敗」。內文中則進一步同仇敵愾地將北韓政府稱作為「偽政權」，並以小標題強調中韓之間的堅固友誼有著深遠的歷史基礎：「中韓關係密切 我朝野均熱望援韓 歷史上我曾兩度出兵救韓」。³⁴ 在隔天7月9日的《中央日報》，更是以近全版的篇幅，透過豐富的照片來向讀者傳達「戰爭中的南韓」；照片包括「現已淪陷」的大韓國總統府、「被北韓共軍破壞的交通」、「南韓救護隊準備出發前線」，以及「旅臺愛國韓僑紛紛組織義勇隊共赴國難」等等。³⁵ 「淪陷」一詞看似平凡，但其實在中文的語境中清楚的代表著「我方」受到敵對的一方不合法甚至不道德的侵害。1950年7月11日的《中央日報》就有一篇標題為「淪陷一年後的南京」的專文，報導昔日的中華民國政府首都南京在1949年淪入共產敵人手下之後受到的破壞。³⁶ 這些關於韓戰／南韓的照片，結合文字報導，例如不用較為中立的字眼——例如：佔領——卻有意地選擇以「淪陷」一詞來形容被北韓共軍攻佔的大韓國總統府，或是強調南韓軍民英勇的反共行動等等，都在在地向臺灣讀者傳達與強化一種對韓戰的認識：韓戰也是我們的戰爭，一場對抗不道德的敵人的戰爭；中韓友誼堅固，同在反共最前線，因此韓戰就如同是「我們」自己的反共存亡的戰爭。

韓戰作為臺灣反共和反攻（中國大陸）的象徵在1953-1954年之間達到了其高峰。韓戰中的一萬四千餘名被俘虜的中國士兵（人民志願軍）當中的反共分子，或反共的人民志願軍俘虜，在1953年獲得聯軍方面應允，依他們不回中國的意向予以處理，並在1954年1月將他們釋放，遣送至臺灣。這些反共戰俘隨即被中華民國政府冠以「志士」、「義士」等名稱，最終稱為「反共義士」。³⁷ 「反

³⁴ 《中央日報》，1950年7月8日。

³⁵ 《中央日報》，1950年7月9日。

³⁶ 《中央日報》，1950年7月11日。

³⁷ 有關的資料可以參考周琇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臺北：國史館，2005年）、《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

共義士」出現的時機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特別的重要。雖然在1950年6月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就介入臺海局勢，但是一直到1953年美方對防衛臺灣的態度都並不積極。蔣介石（1887-1975）、陳誠（1898-1965）、顧維鈞（1888-1985）等人在當時都曾表示出對美國的失望與疑慮；³⁸ 蔣更曾在1953年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上任後寫道：「美國對華政策，其內容與前無異……若不自強，何以復國？」³⁹ 充分表示出他對美國的不信任。在此情況之下，中華民國政府更需要把握各種機會，一方面鞏固政權（強化統治正當性），另一方面提振內部的士氣，才能繼續其「反共大業」。在此之前不久，美國駐臺官員在也曾作出這樣的觀察：「國府部隊的士氣得靠反攻大陸的希望來維持」。⁴⁰ 因此，這些「反共義士」在1953年的出現，給了中華民國政府正迫切需要的一個「反攻大陸的希望」，能夠藉此提振臺灣反共／反攻勝利的士氣。在此脈絡之下，韓戰當然也就更進一步的被建構成為臺灣反共和反攻（中國大陸）的象徵。

事實上早在人民志願軍俘虜的處理問題尚未解決、停戰協定剛剛簽定（1953年7月27日）之際，《中央日報》就已經開始在報導中讚揚韓國方面的處理態度，再次強調中韓一致以反共為目標、情誼堅固：「李承晚告反共華俘保證送至我國……。希望保持信心不要害怕」。⁴¹ 當這群「反共義士」人還停留在韓國境內、尚未抵達臺灣之時，中華民國政府和民間（當然是在官方的動員之下）就已經開始大張旗鼓地報導這些人。《中央日報》於1953年8月27日報導了中

篇（二）》（臺北：國史館，2005年）；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3年）。

³⁸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48-251。

³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2）》，頁90-91，轉引自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51。

⁴⁰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179。

⁴¹ 《中央日報》，1953年7月29日。

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代表團前往韓國「實地慰問反共志士」的消息，並刊出救總的慰問函全文，其中就強調「反共義士」是「最熱愛祖國的男兒，最忠貞不屈的志士；由於你們偉大的反共表現，替我們中華民族爭取了無上的光榮」。⁴²

《中央日報》也不斷地強調這些人尚未抵達臺灣的人民志願軍俘虜，早已是我中華民國反共大業的一分子：文章的標題寫道：「反共華俘 目睹國機蒞臨 驚喜歡呼若狂」；⁴³ 同時也稱頌他們的行為：「簽名大國旗上 表示反共決心」，⁴⁴ 以及「高舉國旗向匪怒吼」。⁴⁵ 進一步地，多篇報導更以標題的方式來主張臺灣／中華民國才是這些人民志願軍俘虜真正的「祖國」：「反共義士慷慨高歌 堅決回臺灣 打回大陸去 磨好刀擦好槍 殺朱毛打俄狼」；⁴⁶ 「一顆心 回臺灣 一條命 殺共匪反共義士第一聯隊 感謝全國同胞慰問」；⁴⁷ 「堅定！堅定！堅定！終必重歸祖國懷抱」。⁴⁸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日報》不斷宣揚這些人民志願軍俘虜是多麼的愛國、愛黨、效忠領袖：「乍聞 總統錄音廣播 全體義士感極涕零 連聯軍官兵亦受感動」，「反共義士一致企望 返回自由祖國 願在 總統的領導之下 與迫害他們的敵人作戰」。⁴⁹ 在最終來到臺灣的「反共義士」當中，確實有部分原先在 1949 年前屬於國民政府軍隊或中華民國政府的成員。但是根據學者後來的研究發現，「來臺戰俘中仍有為數不少之其他背

⁴² 《中央日報》，1953 年 8 月 27 日。

⁴³ 《中央日報》，1953 年 8 月 27 日。

⁴⁴ 《中央日報》，1953 年 8 月 31 日。

⁴⁵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2 日。

⁴⁶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14 日。

⁴⁷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25 日。

⁴⁸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4 日。

⁴⁹ 《中央日報》，1953 年 9 月 25 日。志願軍戰俘營裡面的實際狀況並非如此一心反共，有些戰俘事實上是受堅決反共的同僚逼迫甚至暴力威脅，才選擇表示反共而後前往臺灣的。有關研究可以參考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特別是頁 105、116-118、130-138。

景者」，包括「共黨黨員及動員之群眾學生等等」。⁵⁰因此，1953年之際中華民國政府以及《中央日報》一概將希望來到臺灣的人民志願軍俘虜「再現」為效忠中華民國的一員，並將他們前來臺灣稱作為「回來」，實在是言過其實，更突顯了當時政府積極（甚至帶有急迫性）的宣傳目的。

於此同時，《中央日報》也用顯眼的標題字體來報導臺灣的人民是何等地歡喜在等待迎接這群「反共義士」：「臺灣全省人民團體 支援反共義士來臺 動員月會通過決議組織後援會 並致電慰問歡迎來歸」；⁵¹又以連續而密集的文字和照片報導了「各界代表昨開大會 援助留韓反共義士發動書信慰問 擴大勸募衣物 揭發共匪的洗腦陰謀」；「各地軍公學生掀起捐獻熱潮 為反共義士製寒衣」；⁵²以及「海內外同胞一條心援助留韓義士返國」等等。⁵³這些報導所強調的，都是臺灣人民如何以具體的行動來支持政府的「反共大業」；而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看，無論其內容真假，這些報導所代表的——正如美國大使館在當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在韓戰爆發之後「更注重爭取臺灣人民的支持，以號召大陸人民及海外華僑的歸向」。⁵⁴

從1953年12月開始，中華民國政府就已經開始動員群眾，準備迎接這群韓戰「反共義士」的到來。12月24日，《中央日報》的報導標題就寫著：「全國各界一致聲援 爭取義士自由 援助義士會昨舉行大會 發起『義士自由日』運動」；⁵⁵此可謂後來「一二三自由日」的濫觴。可以想見的是，當這群「反共義士」在1954年1月真正來到臺灣之際，政府是如何全面動員，並以此為證地大肆宣傳臺

⁵⁰ 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頁7。

⁵¹ 《中央日報》，1953年9月20日。

⁵²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8日。

⁵³ 《中央日報》，1953年9月27日。

⁵⁴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196。

⁵⁵ 《中央日報》，1953年12月24日。

灣人民對政府的支持，以突顯自己的統治正當性。1月23日，韓戰「反共義士」在韓國恢復自由，並安排搭船送往臺灣。該日遂被中華民國政府稱為「自由日」。換句話說，代表反共（勝利）的韓戰「反共義士」是「自由日」的基礎。

事實上，在1月23日之前，各項歡迎「反共義士」來到臺灣的活動就已在各地展開，一直持續到「反共義士」實際搭船抵達臺灣的1月27-29日。《中央日報》的報導包括「義士」抵達臺灣的第一站——基隆，準備「響起自由鐘 燃起自由火 獻花 鳴砲 奏樂」來歡迎「義士」，更籌劃了3天的節目來歡迎「義士歸國」和「義士過市」；⁵⁶1月22日，全國「慶義士獲自由 各地火炬遊行 歡迎之聲響徹雲霄」；當天晚上，全國的廣播電臺則以「鐘擺的滴嗒聲昨效果」，「接近『自由日』一秒鐘均緊張的報時」；一到23日子夜，則鳴放「自由的鐘聲」，並接續整天的「慶祝自由日特別節目」；澎湖建立的「自由塔」，也特別安排在23日「子夜奠基」，並舉辦「通宵晚會迎接自由」；臺中也「燃起自由之火」；「義士」抵達基隆的時候，更計劃會有「各界代表出海相迎」。⁵⁷1月23日當天，「各地狂歡慶祝 懸旗結綵舉行盛大遊行」；澎湖「通宵達旦狂歡」；桃園的慶祝會放「自由鴿」；宜蘭則有女中學生以「血書致敬義士」。⁵⁸《中央日報》更特別刊行兩大版（第6-7版）的「反共義士自由日特刊」，並由黨國大老于右任（1879-1964）為標題題字，以多篇專文「歡迎反共義士」，並詳細闡述反共義士來到臺灣所代表的「自由勝利的洪流」、「自由人的輝煌勝利」、「自由戰勝魔鬼」以及「爭自由的偉大勝利 中華民族魂的初步考驗」，更不忘批判中共政權所代表的「謊言系統」終將破產，「毀滅自由者，必將被毀滅」。⁵⁹ 這樣充滿「道德性」的報

⁵⁶ 《中央日報》，1954年1月22日。

⁵⁷ 《中央日報》，1954年1月23日。

⁵⁸ 《中央日報》，1954年1月24日。

⁵⁹ 《中央日報》，1954年1月23日。

導、配合前述各地民眾對「自由日」的支持與響應，其實都是中華民國政府對內強化統治正當性的手段。

而在對外的宣傳，中華民國政府也同樣的藉著韓戰「反共義士」來強調自己的統治正當性。中華民國當時駐韓國的大使就向聯軍方面表示，反共義士獲得自由，「顯示自由必能戰勝奴役，同時並將使鐵幕內人民對暴力統治的反抗，獲得極大之希望與鼓勵。義士不屈意志堅決，象徵著鐵幕內暴力統治已面臨崩潰之危機」。⁶⁰有一份由「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所準備的「歡迎歸國反共義士標語」，收在外交部呈請總統「為義士歸國發表談話」所準備的文件當中，最能代表當時的情緒與對時局的認識：

歡迎反共義士歸國，就是迎接大陸同胞來歸！
歡迎反共義士歸國，就是迎接反共抗俄勝利！
反共義士歸國，是中華民族正氣的表現！
反共義士歸國，是正義戰勝暴力的鐵證！
反共義士歸國，是共匪暴政崩潰的開始！⁶¹

很明顯的，以上這些《中央日報》等官方媒體報導中的文字敘述清楚的把「反共義士」建立成在臺灣的韓戰集體記憶中的核心，並進而塑造「反共義士」及其所代表的韓戰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勝利的象徵。1950年代的臺灣社會也就是在這樣「對內精神喊話」的脈絡之下，透過政府「擴大（甚至略微扭曲）」的宣傳，建立了對韓戰的認識與歷史記憶。

學者在有關記憶的研究中指出，在建構記憶的過程中常會見到政府或媒體運用不同的論述策略。Yinan He（何憶南）在關於中日雙方

⁶⁰（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電〉（1954年1月20日），收於周琇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二）》，頁287。

⁶¹（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電〉（1954年1月21日），收於周琇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二）》，頁289-290、303-304。

的歷史記憶研究中，提出兩個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現象（或是策略）：一是「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self-glorifying），另一是「貶低對手」（other-maligning）。⁶² 在《中央日報》有關韓戰的報導中，也可以看到這些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現象或是策略。一方面，《中央日報》的報導更一再以豐富的感性文字來建構這些「反共義士」是何等的光榮和偉大，稱呼他們是「死神的遺棄者」；同時也正當化這些「反共義士」的行動是「從死神手中掙脫出來」、「黑夜殺匪幹奔向自由」、「義士冒死嘗試『點天燈』」、「壯烈的絕食行動」，⁶⁴ 以及「反共義士進和平村 對匪投石示威……洗腦人員將枉費心機 反共戰俘決不受騙」。⁶⁵

另一方面，《中央日報》關於韓戰的報導也不斷地「貶低」中華民國政府的對手——中國共產勢力，以藉此提昇自己政權和的道德地位。例如在停戰協定簽定之際，報導標題就寫著「停戰商妥消息傳出 匪發動猛烈攻勢 猶圖作最後掙扎 美海空軍出動猛擊」；⁶⁶ 報導內容則寫道，在戰事中「匪兵最懼怕聯軍飛機」；⁶⁷ 報導處理人民志願軍俘虜的過程中，則以標題強調「匪訓練偽裝翻譯人員 企圖滲入監俘委會」，⁶⁸ 以及「匪共違反停戰條款 對反共義士施壓力 偷抄戰俘名單企圖向家屬報復」；⁶⁹ 甚至聯軍方面也「指責共匪 威嚇反共戰俘」，⁷⁰ 並揭發「匪在北韓陰謀」。⁷¹

⁶² Yinan He,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War: Elite Mythmaking, Mass Reac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50- 2006," *History and Memory*. 19: 2 (2007 November): 43-74.

⁶³ 《中央日報》，1953年9月1日。

⁶⁴ 《中央日報》，1953年9月4日。

⁶⁵ 《中央日報》，1953年9月18日。

⁶⁶ 《中央日報》，1953年7月27日。

⁶⁷ 《中央日報》，1953年9月1日。

⁶⁸ 《中央日報》，1953年9月5日。

⁶⁹ 《中央日報》，1953年9月14日。

⁷⁰ 《中央日報》，1953年9月17日。

⁷¹ 《中央日報》，1953年9月14日。

「貶低」共產勢力的策略在1953年10月達到了高峰。韓國境內由印度軍隊負責看管的戰俘營，在10月1日發生了反共戰俘與衛兵之間的衝突，造成數名戰俘的死傷。在臺灣，此一事件引發了力度更高也更情緒化的新聞報導與社會（政治）動員。《中央日報》連續而密集地以標題文字和照片報導了「全國人民激昂悲憤 控訴印軍屠殺暴行」⁷²、「各人民團體同聲呼籲嚴懲殘暴印軍」⁷³以及訴諸國際政治的「各界分電聯合國 抗議印軍暴行 籲請撤銷印中立資格 制止暴行並嚴懲兇犯」⁷⁴之後，更每一天詳細報導各地民眾的抗議行動：臺北市有10萬人大集會「抗議印軍虐殺反共義士」⁷⁵；臺中市先有3萬人、後有5萬人的示威遊行「齊聲怒吼 電慰義士並要求逞兇」⁷⁶；屏東的抗暴示威遊行則有「千萬人在怒吼」⁷⁷最後則是報導臺灣各地舉行大遊行，「抗議韓境印軍殺俘暴行」⁷⁸。但是很快的，譴責的對象就由印度轉為共產中國。《中央日報》的報導就特別藉此貶低（other-maligning）中國共產勢力，其中以10月9日全版「地圖周（週）刊」的報導標題文字最有代表性：「全國憤慨同聲抗議……印軍媚匪 屠殺反共義士」，以及「匪藉監俘機構 破壞志願制度 遣俘會受俄匪操縱 措施乖謬偏袒匪方」⁷⁹。由此可以看出，有關韓戰及「反共義士」的報導其最重要的的目的是在塑造一種「反共」的集體記憶。

這兩種策略的結合，可以從中華民國政府在1953年10月10日國慶紀念大會上，所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之中看到一個頗有代表性的例子：

⁷²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4日。

⁷³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6日。

⁷⁴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5日。

⁷⁵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8日。

⁷⁶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8、9日。

⁷⁷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9日。

⁷⁸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10日。

⁷⁹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9日。

一萬四千多名留韓反共一時的堅決表現，他們具體的發揚了中華民族氣節和精忠報國的精神，證明匪徒們的偽政權早已臨到崩潰的邊緣。⁸⁰

《中央日報》加在此文之前的標題，則以放大的字體寫著：「朱毛奸匪在顛抖了 國慶紀念大會書告同胞 堅定信心滅匪光復大陸」。⁸¹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來，從1950年開始在臺灣的韓戰戰後記憶就是中華民國政府以建構歷史記憶過程中常見的兩個策略——「塑造自己的光榮和偉大」以及「貶低對手」——積極地在塑造一種同仇敵愾的韓戰集體記憶，並以兩個主軸為基礎：一為韓戰代表臺灣「反共」和「反攻（大陸）」的希望，並以此求取臺灣社會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與效忠，以及在臺灣社會建立並強化「大中國」的身分認同；二是韓戰象徵中（華民國）韓兩兄弟國生死與共、友誼堅固，最終必將一同戰勝共產敵人。

在1950年代的臺灣，這種以「反共義士」為中心的韓戰記憶持續地得到中華民國政府與民間各方面的宣傳、複製與加工。1955年「一二三自由日」的一周年正是一江山戰役國軍全軍覆滅的時刻，因此「一二三自由日」以及它所代表的反共／韓戰勝利更是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大肆宣揚。而在往後的幾年中，政府透過紀念「一二三自由日」來宣揚其反共／韓戰勝利的宣傳力道與社會動員更是有增無減。特別是在與一江山的紀念相對照之下，更顯得「一二三自由日」受到了多麼大的注意。此後在每一年的（1月23日）「一二三自由日」前後，在臺灣各地都可以看到大張旗鼓的群眾動員活動與媒體報導，重複地肯定「反共」勝利。其中《中央日報》比較特別的「周年紀念」報導有：在自由日一周年之際，反共義士「化裝遊行市區」與「條條

⁸⁰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10日。

⁸¹ 《中央日報》，1953年10月10日。

道路通自由運動」；⁸² 二周年之際，「自由日遊園會」；⁸³ 三周年之際，「自由鐘聲二十三響」；⁸⁴ 四周年之際，「全國各界盛會申祝 並聲援亞洲鐵幕人民爭取自由 臺北萬人大遊行響應」。⁸⁵ 這些以「反共義士」為中心的慶祝紀念活動與媒體報導，一方面在臺灣塑造並且強化了中華民國「反共」勝利的情緒與道德立場，例如在自由日六周年之際就報導「陳副總統認光復大陸客觀條件已趨成熟 勉國人努力充實自身力量加速共匪崩潰」；⁸⁶ 而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這些「重複、持續、而且具有協調性」的活動與媒體報導使得以「反共義士」為中心的韓戰記憶在臺灣維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使得作為反共象徵的「韓戰」成為了臺灣當時最重要的一種集體記憶。

在1950年代的臺灣媒體報導中的韓戰，特別是作為其代表的「反共義士」，其實是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動員之中迫切需要的一個反共勝利的象徵。透過有關韓戰的各種媒體報導與慶祝紀念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塑造並且強化了自己「反共」勝利的情緒與道德立場，並以此來塑造自己的光榮和偉大以及貶低對手。這些目標其實都是要為了滿足各自當下的政治需要。如果說「韓戰給了國府一個拯救自己的機會」，⁸⁷ 中華民國官方在1950年代所形塑的韓戰集體記憶則是給了國民政府一個「強化自己的機會」，得以在對外情勢險峻之際，發揮對內提昇統治正當性和軍民士氣的作用。研究「歷史記憶」的著名學者 Wurf Kansteiner 曾經指出，一個社會對戰爭的紀念與記憶的建立，往往並非為了了解戰爭的歷史真相，而是為了當前的政治社會需要。⁸⁸ 透過分析在1950年代臺灣對韓戰所形塑的歷史記憶，

⁸² 《中央日報》，1955年1月23日。

⁸³ 《中央日報》，1956年1月24日。

⁸⁴ 《中央日報》，1957年1月23日。

⁸⁵ 《中央日報》，1958年1月23日。

⁸⁶ 《中央日報》，1960年1月24日。

⁸⁷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頁254。

⁸⁸ Wurf Kansteiner,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 188.

我們能夠更清楚地了解歷史記憶其實是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

三、1960-1980 年代：改變的韓戰集體記憶

在1960-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在每年的「一二三自由日」仍然大張旗鼓地動員宣傳。而韓戰的「反共義士」在其中仍然被賦予相當重要的位置。例如在1960年1月23日，「自由日六周年」的慶祝紀念活動中，「自韓返國」的「反共義士」仍然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中央日報》一方面報導他們「感謝同胞支援熱忱」，另一方面則強調他們「希望自由號召續向鐵幕呼喚」。⁸⁹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報導中，這些韓戰的「反共義士」只被當作是眾多「反共義士」的一部分，而非唯一或最重要的「反共義士」。在1960年1月23日同一天，《中央日報》在報導的標題中提到「反共義士上書致敬 懇請 總統繼續領導 俾早日光復大陸完成中興大業」。⁹⁰但是在報導當中作為主角的「反共義士」，是「歷年來自大陸匪區投奔自由祖國的反共義士十六萬三千三百三十四人」，而並非特指來自韓戰的「反共義士」。換句話說，雖然「反共義士」一詞是因韓戰的「反共義士」而在1953-1954年之間所產生的，但是不過幾年的時間，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宣傳論述當中，韓戰的「反共義士」已經逐漸失去原有的核心位置。其實在當時，最受到關注報導的——或是說對中華民國政府最有宣傳價值的「反共義士」，是一位喪命不久的共軍。在當年的1月12日，一架中共的米格15型戰機在宜蘭南澳降落時墜毀起火，飛行員當場死亡。由於無法確認該名飛行員的

⁸⁹ 《中央日報》，1960年1月23日。

⁹⁰ 《中央日報》，1960年1月23日。值得注意的是，此報導的背景是當時蔣中正無視於憲法的規定希望連任第三屆總統，卻引起包括《自由中國》雜誌等國內各方強烈的反對聲浪。

身分，當然也無法得知其動機。但是此一事件卻立刻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匪飛行員駕機投誠」，隨後決定將該名飛行員「禮葬於空軍公墓」，稱呼他為「義士」，豎立「反共起義空軍烈士」墓碑，並定在1月23日舉行盛大的公祭大會，以表揚他「投奔自由起義來歸的壯烈事蹟」；同日也將開始一連三天在臺北的新公園公開展覽該架「投誠匪機」。⁹¹ 在政府的宣傳動員之下，這位無名飛行員成為了當時最受推崇也最被大眾認識的「反共義士」。

這些與韓戰無關的「反共義士」的出現（或在媒體當中的「再現」），當然並未使得韓戰「反共義士」被忽略或遺忘——至少並未立刻造成這樣的結果。但是，對形塑臺灣大眾的集體記憶來說，與韓戰無關的「反共義士」在大眾論述當中的地位越高或在媒體當中被「再現」的篇幅越大，對「反共義士」以及連帶的對「一二三自由日」的認識，就產生了一種「去韓戰」的效果。在1960-1970年代，「反共義士」與「一二三自由日」在國民政府的動員宣傳當中仍然被賦予非常重要的位置，持續地被中華民國政府用以「塑造自己的光榮偉大」以及「貶低對手」（中共）。但是在相關的論述當中，「韓戰」不再被視為重點，甚至出現被邊緣化的現象。這樣的情況在1970年代尤其顯著。以1974年韓戰「反共義士」來到臺灣的二十周年為例，在蔣中正總統（1887-1975）所頒發的書面訓詞當中，對「自由日」的闡述雖然仍會回顧韓戰的歷史，論及1954年「在韓國戰場上，中、韓兩國二萬二千餘共軍戰俘集體奔向自由的偉大義舉」；但是，行文隨則轉為強調「抽象」或「普世」的價值，主張「我們為人類自由與世界和平而奮鬥的責任感」，而「自由日」的意義則在於「團結正義力量，根絕世界禍源」。文中主要的論述只見到「道德性」、「命定性」的精神喊話，完全與韓戰本身、韓國或是「中（華民國）韓情誼」脫離關係：

⁹¹ 《中央日報》，1960年1月21日。

世局已經證明：共產奴役與民主自由的對抗形勢，絕不能經由談判而緩和與解消；反之，姑息、妥協以及中立等謬行，卻助長了共黨的凶燄，導致世局的混亂，帶來人類的禍患。而在另一方面，當前世局也激盪了世界人民逐漸的反共醒覺，喚起了鐵幕內人民反奴役，爭自由的勇氣；世界自由日運動的蓬勃展開，正是順應這一時代潮流的必然趨勢。⁹²

當天，《中央日報》以〈「永久警戒」為自由不可缺的因素〉為題的社論更主張：「一二三」自由日在近年已經成為了「世界自由日」，「這一波瀾壯闊的運動……反映著人類爭自由、反奴役的理性與良知……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追求自由與進步的奮鬥史」。而今日中華民國所追求的反共目標，更是「本乎人類良知，共同創建自由的新世紀，為人類謀幸福，為萬世開太平」。⁹³在這樣的論述當中，「世界」和「人類」取代了韓國，成為中華民國反共的最大支柱；而對擁有「人類爭自由、反奴役的理性與良知」等抽象價值（或信念）作為道德後盾的中華民國來說，反共勝利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不需要以「韓戰」作為歷史的見證，也就不再需要維繫關於「韓戰」的記憶。

隔年1975年，「世界自由日」當天《中央日報》刊出社論〈對自由日進一步的期望〉，當中描述「自由日」的起源是為了要紀念1954年1月23日，「韓境一萬四千五百餘位反共義士唾棄毛共百般威脅利誘，獲釋回到自由祖國，參加反共行列」。⁹⁴這樣的論述雖仍然持續在塑造維繫對「自由日」與「反共義士」的集體記憶，但是卻只有提到「韓境」作為一個空間的背景，對作為歷史背景的那一場戰爭「韓戰」則隻字未提。而在此同時，相關論述當中作為反共主體的人，也不再是韓戰的「反共義士」，而是「全球各洲來華參加世界自由日活動的自由鬥士」。在「世界自由日」的慶祝大會上，蔣總統在訓詞中

⁹² 《中央日報》，1974年1月23日。

⁹³ 《中央日報》，1974年1月23日。

⁹⁴ 《中央日報》，1975年1月23日。

提到的是「中國大陸、北韓、北越、東德以及古巴等各地」不斷奔向自由的人民；世盟榮譽主席谷正綱（1902-1993）介紹的是「韓國反共義士」、「越南反共義士」，以及「最近逃離大陸奔向自由的中國反共義士」。⁹⁵

在上述的論述當中，「反共」很明顯的成爲了一種中華民國政府對臺灣人民的自我精神喊話，不斷地強調中華民國所擁有的「普世」道德優越性，以及「世界」對中華民國的支持。這樣的「反共」論述，在1970年代初中華民國遭受到一連串嚴重的外交挫敗的脈絡之下——例如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其實是維繫中華民國政府對內統治正當性非常重要的手段之一。因此，同樣的論述會重複出現在1970年代中華民國官方的宣傳當中。但是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反共」論述進一步改變了臺灣對韓戰的歷史記憶。隨著「自由日」的「世界化」與「抽象化」，以及「反共義士」的多樣化，韓戰的「反共義士」不再被賦予如1950年代的重要意義，而形塑「韓戰」作爲集體記憶的活動與報導更是迅速地消退。最弔詭的是，原來在1954年「自由日」發起時，代表反共（勝利）的韓戰「反共義士」是此紀念日最重要的基礎。但是到了1960-1970年代，「自由日」的論述中留下了抽象的「反共」意識，卻漸漸地忽略了韓戰的「反共義士」，更明顯地遺忘了促成「反共義士」出現的韓戰。

之後雖然偶爾在反共或「自由日」相關的報導中——例如1979年1月23日的《中央日報》社論〈自由必勝 暴政必亡〉——還曾經見到「紀念韓戰中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集體來歸的日子」等追記韓戰的描述，但是論述的重點都放在如前所述的「普世性」、「歷史必然性」與抽象的信念，主張「中國人民必能重獲自由的歷史法則」、「中國大陸的赤禍實爲世界動亂的禍源」、「因此凡是愛好自由、尊重人權的世人，應該堅定『自由必勝、暴政必亡』的信心，團結一致，共同

⁹⁵ 《中央日報》，1975年1月23日。

來掃除為禍人類的共匪」。⁹⁶ 這般不斷在1970年代出現的「道德性」、「命定性」論述雖然都論及「韓戰」和韓戰的「反共義士」，其實都是作為中華民國在外交處境越趨艱困之際——特別是1978年「中（華民國）美斷交」之後——急切需要的自我精神喊話；其訴求與目的都與「韓戰」本身無關，也因此對二十餘年前發生的這場戰爭並未多加著墨。反而，隨著這些論述的出現，到了1980年代「韓戰」在中華民國官方所塑造的集體歷史記憶中的地位雖然仍然存在，卻已經明顯地開始萎縮。

事實上，早在197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對「韓戰」本身（歷史）的關注就已經開始消退。1970年6月25日是韓戰爆發二十周年。在6月25-26日，《中央日報》報導了大韓民國、北韓和「共匪」（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韓戰二十周年的各種聲明或紀念活動，卻沒有任何中華民國官方對此周年的談話或活動。更值得注意的是，以版面大小和位置來看，一篇標題為〈大韓民國紀念韓戰二十周年〉的報導雖然被放在第2版，但是卻被置於該版的最下方，並以最小的標題字體來標示。⁹⁷ 很明顯地，在最重要的周年紀念日都不受重視，「韓戰」在中華民國官方的論述與宣傳中已經不再被視為與臺灣關係密切的歷史事件。而失去了官方主導的「重複、持續、而且具有協調性」的活動與媒體報導之後，「韓戰」在1970年代當然也就無法維持如1950年代在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中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戰爆發二十五周年的1975年6月25日，《中央日報》倒是刊載了題為〈韓戰二十五周年論韓局安危禍福〉的社論。該文在開頭首先詳細描述了韓戰爆發的經過、各國軍隊參戰的過程，以及最終的停火協議。但是該文的主要內容，其實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討論「朝鮮半島局勢」，特別是北韓與美國之間的政治軍事角力。文章的主旨，是在結論中強調要「以戰止戰」來處理當今的

⁹⁶ 《中央日報》，1979年1月23日。

⁹⁷ 《中央日報》，1970年6月26日。

朝鮮半島局勢，⁹⁸ 似乎在呼應該版另一篇關於韓戰周年的報導，〈韓戰今屆廿五周年 全韓進入緊急戒備 季辛吉斥北韓最具侵略性〉。同日的另外一篇報導——〈金振晚副議長強調 中韓立場一致 同為收復國土努力〉——談到韓國國會副議長在訪問臺北時表示，「兩國應共同為抵抗共黨侵略，收復國土而努力」。雖然文中仍然強調「大韓民國與中華民國有相同的環境與立場」，⁹⁹ 但是對照前述在韓戰剛剛爆發時韓國派駐中華民國的領事閔石麟所發表的聲明（1950年6月29日）就可以看得出來，¹⁰⁰ 當年因韓戰而更為深化緊密的中（華民國）韓情誼到了1970年代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在報導中強調的是「蔣公……對大韓民國的獨立，多所協助，韓國人民都對 蔣公的恩德，念念不忘」；¹⁰¹ 韓戰對中（華民國）韓關係的影響和歷史意義則完全被忽略。綜觀1975年韓戰爆發二十五周年時中央日報的相關報導，完全沒有提及韓戰「反共義士」，或是韓戰對臺灣的影響，似乎韓戰或紀念韓戰是「他者」的事情，跟臺灣並沒有任何關係；而論及中（華民國）韓情誼，卻又與韓戰無關。由此可見，「韓戰」在最有關聯性的時刻與報導中都被忽略不談，其在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中的地位已不復以前的重要。

同樣的情況，在1980年韓戰爆發三十周年的《中央日報》中也可以看到。1980年6月25日的報紙中，唯一與韓戰有關的文章是在〈韓控北韓 意圖南侵〉的標題之下，一小段轉載外電的報導，提及韓國與中共方面分別在「韓戰爆發卅周年」發表聲明。¹⁰² 無論是在標題或是內容方面，韓戰與對韓戰的紀念都被「再現」為「他者」的事情，似乎都與中華民國／臺灣無關。另外，從當日的《中央日報》倒是能夠得到一則有趣的觀察。在頭版的中段位置，「傳記文學出版

⁹⁸ 《中央日報》，1975年6月25日。

⁹⁹ 《中央日報》，1975年6月25日。

¹⁰⁰ 《中央日報》，1950年6月29日。

¹⁰¹ 《中央日報》，1975年6月25日。

¹⁰² 《中央日報》，1980年6月25日。

社」刊載了一欄橫跨全頁的廣告。在該廣告的最中央位置——也就是中央日報頭版的中心位置——推銷的是由中華民國前駐韓國大使邵毓麟（1909-1984）所著、先前在《傳記文學》連載而即將在該年8月集結出書的《使韓回憶錄》。邵毓麟在1949年奉派前往韓國出任大使一職，一直擔任到1951年卸任；1950年韓戰的爆發正是邵大使在任期間。如果韓戰被視作爲臺灣集體歷史記憶的一個重要部分，像這樣一件對中華民國／臺灣帶來重大影響的歷史大事，廣告刊載當天又正值韓戰三十周年，「韓戰」理當成爲《使韓回憶錄》的一大焦點或行銷的一大賣點。但是，廣告中將該書定位爲「一部前所未有的韓國獨立史與中韓關係史」，只強調「自我國協助韓國獨立運動及韓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復國建國工作以迄朴正熙大總理逝世止，邵先生均直接或間接參與其事」，¹⁰³卻完全沒有提到中（華民國）韓關係中最重要歷史事件之一的韓戰。從上述幾例中可以看出，1980年代在臺灣無論是官方或民間所形塑的關於中（華民國）韓關係的集體歷史記憶中，韓戰的地位已經是微乎其微。

1950年代在國家動員之下所建構的韓戰集體記憶，歷經1960年代「自由日」的「世界化」與「反共義士」的「多樣化」，到了1970年代更不再有任何由官方所主導的重複、持續、而且具有協調性的活動與媒體報導以「韓戰」爲主題，以至於到了1980年代「韓戰」在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中幾乎已經消失。雖然每年的「自由日」紀念活動依舊高喊「反共」，卻已經很少有對韓戰或韓戰「反共義士」的追念。面對這樣的情況，《中央日報》在1989年1月23日刊載了一篇張希哲（1918-2014，時任立法委員）寫的文章最具代表性，標題是：〈自由與反共——勿忘韓戰反共義士奔向自由的血淚〉。¹⁰⁴

¹⁰³《中央日報》，1980年6月25日。

¹⁰⁴《中央日報》，1989年1月23日。

四、1990年代以後：被遺忘的韓戰

到了1990年代，臺灣對「韓戰」的記憶更產生了根本的變化。1990年代的臺灣正是一個波濤洶湧的時代，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發生了許多非常巨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當中，又有好幾股力量對臺灣的韓戰記憶有了直接的影響，特別是臺灣身分認同的改變，以及臺韓關係與臺灣對韓國態度的改變。

（一）臺灣身分認同的改變

從在臺灣的韓戰記憶當中受紀念的主體（人物）來分析，臺灣的政府與人民並未直接（或公開的）涉入韓戰，在地理位置上韓戰的戰場也距離臺灣甚為遙遠。雖然有少數的軍中翻譯官是美軍與中華民國政府合作在臺灣挑選而派往韓戰的戰場，但他們的參與一直到近幾年才得到公開。¹⁰⁵所以在1953年以後，在臺灣唯一被作為韓戰記憶當中受紀念主體的人就只有在1954年從韓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俘營前送來到臺灣的一萬多名「反共義士」。¹⁰⁶自1954年以來，在臺灣的韓戰論述多以反共（義士）為主軸，而依此延伸出來以紀念慶祝反共義士來臺的「一二三自由日」則持續地被作為建構並強化韓戰記憶以及反共意識形態的主要活動。特別是對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反共義士被塑造成為韓戰記憶的核心，反共義士的來臺則被視為等於反共戰爭的勝利。而最重要的是，反共戰爭的勝利則代表著中華民國政府得

¹⁰⁵ 請參見幾位當事人的回憶錄：黃天才：《我在38度線的回憶》；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

¹⁰⁶ 近年來已經有了以下的學術探究成果：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3年）；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周琇環：〈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1950-1953）〉，《國史館館刊》第24期（2010年6月），頁45-88、〈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1950-1954）〉，《國史館館刊》第28期（2011年6月），頁115-154。

以繼續對內對外宣稱自己是中國（包括臺灣）唯一的合法政權。因此，我們可以說1950年以來在臺灣對韓戰的記憶，與反共意識形態以及國民政府的統治正當性之間存在著一種共生共存的（symbiotic）關係。也因此，即使在前述的1970-1980年代，雖然韓戰的「反共義士」不再被賦予如1950年代的重要意義，「韓戰」在國民政府對反共相關的論述與歷史記憶建構之中還留有一席之地。

但是自1990年代開始，臺灣的政治環境產生了巨大的改變，臺灣也進而經歷了快速而巨大的身分認同轉變。一方面，臺灣國內興起了民主化的要求，以及語言、文化和教育的本土化。1990年代中開始的各種政治改革（特別是1996年開始的總統直選）以及教育文化方面的改革（特別是《認識臺灣》教材的編撰與採用），快速地促成了臺灣的大眾——特別是當時正在就學的1980年代末之後出生的一代——開始以「臺灣」（而非「中國」）為政治認同的對象。¹⁰⁷而在此同時，另一方面外在則有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在這樣的變化之下，臺灣人民的想法和主張促使中華民國政府改變已經奉行了幾十年的兩岸政策：先是開放了臺灣人前往大陸探親，之後更進一步的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不再將「反共」和「反攻（大陸）」作為國家的目標。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臺灣為主體的政治與身分的認同。

新的身分認同則需要新的集體記憶。在這樣的變化脈絡之下，從1950年開始在臺灣以「大中國」的身分認同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歷史記憶也就會受到檢討甚至拋棄，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以「反共」為主軸的韓戰歷史記憶。如歷史學者黃克武所論，「一二三自由日」在解

¹⁰⁷ 相關的研究可以參見 Ste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2)。特別是其中的 Stephane Corcuff, "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73-97, Chia-Lung Lin, "The Politic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219-239, Rwei-ren Wu, "Toward a Pragmatic Nationalism," 196-213。

嚴之後迅速的失去了其原有的反共意義。¹⁰⁸ 特別是在政治的層面上，韓戰的記憶原來從 1950 年代以來一直有助於強化中華民國政府的反共意識形態以及統治正當性，也因而得到不斷地複製。但是對 2000 年以後在臺灣執政的民主進步黨（以及同樣的，對 2008 年之後重新執政的國民黨）而言，它的統治正當性完全來自臺灣的民主選舉，與過去國民黨政府所仰賴的反共意識形態，或是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主張完全沒有關聯。在這樣的變化之下，過去以「反共」為訴求的韓戰記憶也就失去了它的價值。

研究歷史記憶的著名學者 John Gillis 曾經指出，新的集體記憶是在具有「協調性的遺忘」（concerted forgetting）當中所建構而成的。¹⁰⁹ 根據這個觀點，本文要更進一步指出的是，過去從 1950 年開始在臺灣以「反共」為基礎所建立的「韓戰」歷史記憶，在 1990 年代以來就是在這樣一種具有「協調性的遺忘」當中迅速地消退。1990 年代以來，臺灣官方雖然仍然行禮如儀的每年舉辦「自由日」的相關紀念活動，但是過去所堅持的「反共」早已成為歷史，而關於韓戰的論述也幾乎完全消失。在此「協調性的遺忘」之下，作為反共戰爭代表的「韓戰」，更失去了在大眾的歷史記憶中的地位。即使臺灣的官方仍然偶爾在特定的時間舉辦有關韓戰的紀念活動——例如在 2004 年（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政府曾經舉辦過一系列的紀念活動——但是這樣零星的對韓戰的「再現」，都難讓韓戰再次成為臺灣集體記憶的一個重要部分。

¹⁰⁸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

¹⁰⁹ John Gillis, "Introduction: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ohn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二) 臺韓關係與臺灣對韓國態度的改變

中華民國與韓國的雙邊關係自韓戰以來一直非常地密切，而臺灣對韓戰的紀念也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持續地進行。韓戰的勝利被視為是中華（華民國）韓雙方共享的反共勝利，更是中韓堅定友好關係的一種象徵。

但是正當1980年代末期冷戰結束，反共的意識形態在臺灣開始受到挑戰之際（1987年開放赴大陸探親，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中華民國與韓國的關係也恰好因為外交上的問題而降到了最低點。臺灣一位專門採訪韓國新聞的記者朱立熙（曾在延世大學進修研究多年）指出，發生在1983年5月5日的「中共民航劫機事件」（或稱「六義士劫機案」）是這中間最大的「衝擊性事件」。事件其後韓國政府的處理態度（例如，並未立即將劫機的六人送往臺灣，反而將他們送審並判刑），讓當時仍處在反共意識形態高點的臺灣社會首次認識到臺韓之間在面對中國時所存在的嚴重歧見，更因此產生了對韓國極端情緒化的負面反應。¹¹⁰朱立熙更進一步指出，其間臺灣民眾從媒體報導的內容中不斷看到的是「韓國政府『欺負』我們的『反共義士』，於是便引發了情緒化的激情與衝動，一股強烈的反韓情緒便從此被揭揚起來了」。再加上在此期間1984年發生的「亞青盃籃球賽」事件（臺灣的選手在韓國出賽時由於國旗國歌的爭議而退出比賽），¹¹¹這些糾紛更使得「臺韓關係順勢一落千丈」，徹底的轉變了臺灣社會對韓國的態度。¹¹²

1992年8月，中華民國與南韓之間正式斷絕了外交關係，此後臺韓關係就每況愈下，臺灣對韓國的態度也不曾好轉。但特別值得注

¹¹⁰ 朱立熙：《再見阿里郎：臺韓關係總清算》（臺北：克寧出版社，1993年），頁84-88。該作者曾擔任臺灣「韓國研究學會」理事，並在延世大學進修研究多年，見頁9、24。

¹¹¹ 朱立熙：《再見阿里郎：臺韓關係總清算》，頁32。

¹¹² 朱立熙：《再見阿里郎：臺韓關係總清算》，頁31-32。

意的是，臺灣之前也曾經經歷過與其他的「友邦」斷交，例如1972年與日本斷交以及1978年與美國斷交。但是臺灣與其他國家斷交之後的情緒反應以及態度的轉變，都遠不及於對韓國的這般巨大（以及惡化）。朱立熙作了以下有關兩國斷交的分析報導，相當程度地反應了臺灣社會從1980年代以來對韓國的態度的巨大轉變：

儘管臺灣人知道是我們自己的外交政策必須負更大的責任，但是他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我們這兩個曾經是亞洲最反共的患難兄弟，為什麼也會走上分手之路？因此臺灣人眼看著韓國一再表明要棄他而去，情緒上的反彈自然會比較強烈。¹¹³

而更深層的原因，朱立熙則追溯到中華民國的政府與人民長期以來自認為「中華民族」及其與韓國之間的歷史關係：

在先天上，中國人（不論海峽兩岸）原本就不太看得起韓國人（甚或朝鮮人），中國人基於他的「大中華意識」，對這個曾經是它的藩屬的半島上的人民，原來就有著先天上的優越感。許多臺灣人甚至直覺地認為，當年國民黨政府對韓國在上海臨時政府的援助，絕對有功而且有恩於韓國人；加上戰後蔣介石對韓國獨立的支持，以及當年韓國駐華大使金信與蔣介石之間的「義父子」之間的關係，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間的關係是從「藩屬與宗主國的關係」到「父子關係」，到戰後才又成為「兄弟關係」。如今，作為「弟弟」的韓國，竟然反過來要欺負「哥哥」，如此先天的優越感再（加）上後天的受害意識，互相衝激之下，反韓情緒自然愈來愈高漲了。¹¹⁴

朱立熙以上的分析或許無法代表整體臺灣社會的想法與心態，但是的確部分解釋了臺灣社會為何會產生對韓國的這種錯綜複雜的情

¹¹³ 朱立熙：《再見阿里郎：臺韓關係總清算》，頁31。

¹¹⁴ 朱立熙：《再見阿里郎：臺韓關係總清算》，頁34。

感，甚至形成了一道不願了解彼此甚至忽視、鄙視、敵視對方的隔閡。最近的例子是在2010年，臺灣的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在亞運賽遭裁判判定犯規而失去比賽資格之後，臺灣爆發了強大的反韓情緒，甚至發起了抵制韓貨的運動。¹¹⁵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臺灣對韓國所發生的歷史，即使是「韓戰」這樣對臺灣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都產生不出多少興趣，也使得韓戰與其對臺灣的歷史意義被忽視。針對臺灣社會對韓國的複雜情緒以及歷史經驗同時存在的相似與疏離，歷史學者陳芳明就提出以下這樣的看法：

縱然臺韓在戰後有過四十年的邦交友誼，竟從未在學術上構築歷史經驗的交流。從殖民史到戰後史，臺灣與韓國的歷史進程，何等重疊，又何等相似……。在如此深厚的歷史基礎上，反而使臺韓成為相互異化的絕緣者。¹¹⁶

就是在1990年代以來這樣臺韓關係急遽惡化的脈絡之下，原來代表著中（華民國）韓生死與共、友誼堅固的「韓戰」，就更徹底地在臺灣的集體歷史記憶當中被忽略，以至於成為被遺忘的戰爭。

五、結論

2013年是韓戰停戰的六十周年。在該年的1月23日，臺灣的報

¹¹⁵ 時過數年，仍然可以在臺灣的網路上找到許多充滿反韓情緒的討論。有關的新聞報導，參見民視：〈失格效應民眾抵制韓國貨〉，網址：<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0B19L03M1>，檢索日期：2013年3月13日；自由時報電子報：〈聲援楊淑君 彩券行公告：拒賣韓國人〉，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0/new/nov/19/today-north10.htm>，檢索日期：2013年3月13日；NOW News：〈楊淑君遭判失格 蔡阿嘎抵制韓貨、蘇麗文誓言復仇〉，網址：<http://www.nownews.com/2010/11/18/11490-2665367.htm>，檢索日期：2013年3月13日。

¹¹⁶ 陳芳明：〈序：雪落韓半島〉，收於石曉楓：《無窮花開——我的首爾歲月》（臺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11年），頁9-10。

章仍然可以看到有關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簡稱世盟）中華民國總會舉辦了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的報導，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並受邀在會上致辭。¹¹⁷ 但是這個消息並未見於報紙的前幾個版面，報導的篇幅也不過幾個短短的段落。就如同本文前述在1970年代開始對「自由日」紀念的「抽象化」與「世界化」，該年大會的主題為「民主鞏固——挑戰與願景」，¹¹⁸ 媒體報導的焦點則放在世盟邀請的各國來賓，以及在該會上宣示計劃邀請緬甸的民主運動領袖也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翁山蘇姬（1945-）來臺灣訪問。¹¹⁹ 無論是媒體的報導，或是臺灣總統的談話，幾乎都完全的忽略了韓戰對「自由日」以及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與意義。少見的例外是在《自由時報》的一篇報導中，簡短地提到了同時應邀出席慶祝大會的，還包括了二十多名參與韓戰後選擇到臺灣投誠的反共義士。¹²⁰

而中華民國官方的論述，則更是明顯地忽略韓戰對臺灣的重大影響與意義。就以當時總統府的新聞發布稿為例，其中一篇僅僅在回顧自由日歷史的時候提及韓戰一次，但是重點仍然放在抽象的「以彰顯人們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具有重要的意義」。¹²¹ 而另一篇接待外賓的新聞稿則更是隻字未提韓戰，報導的重點完全放在當時政府正在大力推動的「兩岸和解」與臺灣—中國之間的和平願景：

過去近5年來，政府努力改善兩岸關係，降低臺海緊張情勢，

¹¹⁷ 《自由時報》，2013年1月24日，A5版。

¹¹⁸ 聯合新聞網，網址：<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1/7652603.shtml#ixzz2JGPY2RbZ>，檢索日期：2013年1月28日。

¹¹⁹ 《自由時報》，2013年1月24日，A5版；〈世盟擬邀翁山蘇姬訪臺〉，《中央社／中央廣播電臺》，網址：http://news.rti.org.tw/m/jqm_newsContent.aspx?nid=402514，檢索日期：2013年1月28日。

¹²⁰ 《自由時報》，2013年1月24日，A5版。

¹²¹ 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出席2013年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世盟中華民國總會第57次會員代表大會暨世亞盟年會〉，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9087&rmid=514>，檢索日期：2013年1月28日。

未來亦將持續在和平繁榮的目標下推動兩岸交流，促進兩岸在國際社會和平相處、相互尊重，期讓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成爲良性循環。¹²²

研究「歷史記憶」的學者 John Gillis 曾經作出這樣的結論：「對身分認同的概念依賴著對記憶的認識，而反之亦然」。他也進一步提醒我們，記憶（以及身分認同）「都不應被視爲是一成不變的物體，而是對現實的再現或建構，是主觀而非客觀的現象」。¹²³ 戰後這六十年來韓戰記憶在臺灣的興衰變化，恰恰反映了歷史記憶隨著身分認同同步改變的現象，也清楚的顯現了歷史記憶作爲一種主觀性的對當下政治社會現實的再現。而從觀念史的角度來看，歷史記憶更與當代社會的觀念有著密切的關係：一方面，當代許多的政治觀念都在歷史記憶的產生過程中被製造與傳播。例如在1950-1960年代之間，可以清楚的看到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所主張的「萬惡的共匪」、對「中共」所堅持的「漢賊不兩立」，以及將國際社會中對我國友好國家視爲「兄弟之邦」（如韓國）等等觀念，在官方對韓戰所建構的歷史記憶當中都不斷的被複製、強調。但是在另一方面，「韓戰」歷史記憶在臺灣的「變化」更反映了在客觀環境的影響之下，當代的政治觀念如何地改變。特別是本文中所分析的，在1970年代以後的「反共」論述中，韓戰「反共義士」的地位逐漸被邊緣化，而由中華民國的「普世」道德優越性以及「世界」對中華民國的支持所取代。這樣的變化代表了在國際處境越趨艱困之時，中華民國政府基於現實環境的考量，透過對歷史記憶的建構將「反共」此一觀念從原來比較具體的「抗爭性」——韓戰「反共義士」所象徵的戰爭手段——逐漸轉變成

¹²² 中華民國總統府：〈總統接見2013年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暨世亞盟年會與會外賓〉，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9089>，檢索日期：2013年1月28日。

¹²³ John Gillis. "Introduction: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ohn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為抽象、精神層面的「道德性」——以「全球各洲來華參加世界自由日活動的自由鬥士」為代表。而歷史記憶對當代政治觀念所帶來的變化，更進一步反映在1980年代中華民國官方的「反共」國策口號從「抗爭性」的「反攻大陸」轉變成為「道德性」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本文對「韓戰」歷史記憶在臺灣的建構與變化所作的分析，同時也說明了歷史記憶與政治觀念之間相互的影響。

在近年來「自由日」的相關紀念或是報導當中，不但極少見到有關韓戰與臺灣歷史的討論，自由日甚至被重新包裝，成為了臺灣國際行銷，推銷觀光的機會。例如在2013年，臺北市長郝龍斌在「自由日」前一天的國際外賓歡迎酒會上致詞時，「大力行銷臺北市，不僅治安好，美食多、風景佳，希望大家利用機會好好參觀」。¹²⁴ 這樣的一個對「自由日」的消費，恰恰給「韓戰」在臺灣的歷史記憶作了一個很好的對照。如歷史學者黃克武所論，「一二三自由日」在「脫掉了『反共』的外衣之後」，成為了一個被重新包裝也被民間挪用的「自由日」。¹²⁵ 但是「韓戰」與韓戰的歷史記憶一旦失去了「反共」的脈絡，在臺灣似乎就失去了所有的價值，連被挪用或被消費的機會都沒有。從1950以來這六十餘年間，韓戰因「反共」而起，進而被國民政府視為「我們的」戰爭；但是，「韓戰」也因為「反共」（立場的改變）而墜，變成今天在臺灣「被遺忘的」戰爭。¹²⁶

¹²⁴ 〈慶祝自由日 郝龍斌行銷臺北市〉，《中央社》，網址：<http://tw.news.yahoo.com/%E6%85%B6%E7%A5%9D%E8%87%AA%E7%94%B1%E6%97%A5-%E9%83%9D%E9%BE%8D%E6%96%8C%E8%A1%8C%E9%8A%B7%E5%8F%B0%E5%8C%97%E5%B8%82-112411519.html>，檢索日期：2013年1月28日。

¹²⁵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

¹²⁶ 有趣的是，在臺灣的眾多媒體當中，少數在韓戰停戰六十周年的2013年還想到要撰文對「韓戰」或韓戰「反共義士」作專題報導的媒體之一並非官方媒體，竟然是以八卦娛樂新聞為主要賣點的《壹週刊》。該刊以一位「韓戰戰俘」為主角，深入地報導了韓戰「反共義士」來到臺灣之後的經歷。見〈後來怎麼了：123不自由——1950年代韓戰戰俘張一夫的離奇人生〉，《壹週刊》，2013年3月14日，頁76-80。

附錄：學生調查

2013年我在當時所任教的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的必修課「臺灣史」的課上對學生進行了此項調查。課上大多數都是歷史學系大學部的學生，少數是外系來選修的學生。學生的年齡分布在18到23歲之間。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班上有3、4位學生是「僑生」（在臺灣念大學的海外華人，多數來自香港、澳門、和馬來西亞等地）。

在不記名的情況之下，我請上課的40多位同學自願性的作答；合計有37份有效回答，在第一部分的作答時間，我依序問了學生以下的六個問題，而回答「韓戰」作為答案的人數如下：

	請列舉歷史上最 重要的戰爭	請列舉歷史上 第二重要的戰 爭	請列舉臺灣歷 史上最 重要的 戰爭	請列舉臺灣歷 史上第 二重要 的戰爭	從小學到大 學的歷史課 中，你學到 最多的是哪 一個戰爭？	從小學到大學 的歷史課中， 你學到第二多 的是哪一個戰 爭？
韓戰	0	3	2	3	0	0

結果，在每一個題目回答「韓戰」的比例都低於10%。很明顯地，對這些學生來說，在被要求直覺的反應回答的時候，韓戰並不被認為是多麼重要的戰爭或歷史。

接下來，學生繼續地回答了以下經過提示後的問題：

請根據其對臺灣歷史的影響，從以下的名單中選出3個最重要的戰爭、並依其重要性排列：鴉片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清法戰爭（1883-1885）、冷戰、鄭成功與荷蘭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韓戰、1937-1945年的中國抗日戰爭、越戰、甲午戰爭。

結果，選擇韓戰的人數大為增加，共有5位學生認為韓戰是對臺灣歷史影響最重要的戰爭，4位認為是第二重要，7位認為是第三重要（合

計佔該班37份回覆的43%以上)。

最後，學生回答了以下帶有最直接明顯提示的問題：

如果1代表在臺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戰爭、10代表重要性最低的戰爭，你會給韓戰排第幾？

結果，選擇韓戰的人數更為增加，共有8位學生認為韓戰是對臺灣歷史影響最重要的戰爭，4位認為是第二重要，10位認為是第三重要（佔該班的近60%）。有趣的是，另外有6位認為韓戰是對臺灣歷史影響是第四重要的戰爭。如果加上這些學生，則學生認為韓戰對臺灣歷史影響重要的比例高達75%。

徵引書目

《NOW News》

《中央日報》

《中央社／中央廣播電臺》

《民視》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電子報》

《壹週刊》

「中華民國總統府官方網頁」

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

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芄、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二冊）》，臺南：南一書局，2012年。

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芄、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二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年。

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芄、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六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年。

王秋原等主編，李其芄、邱德慈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第四冊）》，臺南：南一書局，2013年。

石曉楓：《無窮花開——我的首爾歲月》，臺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11年。

朱立熙：《再見阿里郎：臺韓關係總清算》，臺北：克寧出版社，1993年。

江筱婷、李佩錕、汪盟烽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四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3年。

江筱婷、李佩錕、洪立建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二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2年。

- 江筱婷、洪立建、徐靜欣等編撰：《國中社會課本（第六冊）》，臺北：康軒文教公司，2014年。
- 李福鐘、古偉瀛、王世宗等編著：《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臺北：三民書局，2013年。
- 汪宏倫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 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史館，2013年。
- 周琇環：〈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1950-1954）〉，《國史館館刊》第28期，2011年6月，頁115-154。
- 周琇環：〈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1950-1953）〉，《國史館館刊》第24期，2010年6月，頁45-88。
- 周琇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臺北：國史館，2005年。
- 林能士主編，施志汶、張素玢等編撰：《高中歷史（第一冊）》，臺南：南一書局，2012年。
- 林能士主編，陳秀芳、吳翎君等編撰：《高中歷史（第四冊）》，臺南：南一書局，2014年。
- 林能士主編，楊維真、王良卿等編撰：《高中歷史（第三冊）》，臺南：南一書局，2013年。
-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王良卿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二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1年。
-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王良卿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四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2年。
- 林能士等主任委員，于珊、宋幸蕙等編撰：《國民中學社會課本（第六冊）》，臺南：翰林出版公司，2013年。
- 林麗雲：〈變遷與挑戰：解禁後的臺灣報業〉，《新聞學研究》，第95期，2008年1月，頁183-212。

-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
- 馬全忠：《中華民國百年紀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 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年。
- 高文俊：《韓戰憶往：浴血餘生話人權》，臺北：生智文化公司，2000年。
- 國史館編：《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年。
- 張淑雅：〈近二十年來的韓戰研究概況〉，《近代中國》第137期，2000年6月，頁105-116。
- 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臺北：衛城出版社，2011年。
- 陸以正：《微臣無力可回天——陸以正的外交生涯》，臺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 黃天才：《我在38度線的回憶》，臺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10年。
- 董致麟：《韓戰爆發前後蘇中（共）美互動之研究（1945-1951）：認知理論的觀點分析》，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劉維開：〈蔣中正對韓戰的認知與因應〉，《輔仁歷史學報》第21期，2008年7月，頁253-282。
- 賴澤涵主編，蔡怡邦、王宇等編撰：《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一冊）》，臺北：全華圖書公司，2012年。
- 薛化元主編，李明仁、李福鐘等編輯：《普通高級中學歷史（第一冊）》，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
- Corcuff, Stephane. "The Symbolic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te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2.

- Gillis, John. "Introduction: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ohn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e, Yina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the War: Elite Mythmaking, Mass Reactio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1950-2006", *History and Memory*, Vol.19, No.2 (November 2007).
- Kansteiner, Wurf.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Collective Memory Studies", *History and Theory*, 41, 2002.
- Lin, Chia-Lung. "The Political 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In Ste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2.
- Wu, Rwei-ren. "Toward a Pragmatic Nationalism". In Stephane Corcuff, ed., *Memories of the Futur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Taiwan*.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2002.